

组建多支抗日武装 “敢在鬼子头上跳舞”

本报记者 孙越
通讯员 万照广

在枣庄市薛城区抗战英烈孙伯龙次子孙继龙家中,讲起自己的父亲,81岁的孙继龙拿着手中仅存的老照片说:“父亲牺牲时才39岁,那年我才7岁。”

“听长辈说,我父亲年轻时一腔爱国热忱,五四运动爆发后,积极组织和发动学生,抵制、收缴日货。”孙继龙说,父亲1926年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,后随国民党第四十军开进鲁南。因在党内受到排挤,孙伯龙回乡办学。

抗战开始后,孙伯龙组织起一支30多人的抗日武装,活跃在枣庄附近的张林村一带,逐渐发展到100余人。1938年6月,经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组织,山外抗日联军联合委员会成立,孙伯龙被推选为副主任委员。

1939年6月,孙伯龙被任命为鲁南游击司令部特务二旅旅长。时年7月13日,孙伯龙根据准确情报,在曹家埠设伏,与邵剑秋部协同作战,全歼日军四支郎君小队22人,开创了苏鲁边区全歼敌人一部的范例。

罗荣桓、陈光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不久,

孙伯龙部归一一五师建制,改编为苏鲁支队。同年12月底,孙伯龙被任命为新组建的运河支队支队长。运河支队与苏鲁支队三大队、峰县支队、四县边联支队等抗日武装,充分发挥八路军游击战术的威力,使敌人屡遭重挫,真正成为“敢在鬼子头上跳舞的英雄人民抗日武装”。

1940年10月12日,孙伯龙亲率两个中队在朱阳沟村与敌激战一天,他指挥果断,身先士卒,部队愈战愈勇,顺利突围。此战,运河支队以50人伤亡的代价,取得了歼敌近400人的战果。

“当时11月份,罗荣桓等师首长听取父亲的战斗总结后,给予很高评价,时值鲁南军区刚刚建立,父亲被任命为鲁南军区副司令员。”孙继龙说。

1941年1月,孙伯龙组建峰山支队,多次率部拔据点、除敌顽,粉碎敌人的“扫荡”、“围剿”。

“1942年1月1日晚,峰山支队与驻村村民举行新年晚会,日军乘机集结千余主力包围了毛楼子村,父亲在突围中不幸牺牲。”孙继龙说,时任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闻讯后,曾高度评价孙伯龙的一生是坚持团结抗战的一生。



【孙伯龙】

予日寇沉重打击。后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。抗战期间组建多支抗日武装,在鲁南地区给1908年生于枣庄峰县四区,1942年牺牲。

大战前写下遗书 劝说妻子改嫁

本报记者 赵松刚 孙国祥

7月25日,在潍坊市潍北监狱一座朴素的职工院子里,85岁的郑作民坐在一棵无花果树下,耳聪目明,身体硬朗,说话依旧保持着军人的嘹亮风格,“接到了到北京参加检阅的通知,我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
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,郑作民将是老兵方队的一员,而且是潍坊唯一一位。

郑作民的这份光荣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他的父亲郑作民。

郑作民生于湖南新田,少时成绩优异,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,毕业后进入蒋介石部队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,35岁的郑作民已是国民党陆军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。

在奔赴抗日战场以前,郑作民宣读了给母亲的遗书:“男现率师重上战场,抱定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,誓与敌寇战斗到底,把敌人赶出去。”其后,郑作民先后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、徐州会战、田家镇保卫战。

1939年11月,侵华日军攻占南宁、昆仑关,逼近西南抗战大后方。国民党当局决定

发动反攻,时任第九师师长的郑作民奉命率部自贵州都匀出发,开赴昆仑关前线,参加昆仑关战役。临行前,郑作民立下遗嘱,安排家事。

“他把我和六个兄弟姐妹送回湖南老家,还让我的母亲改嫁。他是抱着必死的信念去打这一仗的,没有想到真的没有回来。”时年,郑作民10岁,他还记得父亲临行前嘱托他,要和母亲一起照顾好幼小的弟弟妹妹。

“父亲是1940年1月战死的,他的尸体埋在战场上,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,最后被发现的时候已经长了蛆。”郑作民说。

郑作民牺牲后,蒋介石题词“马革裹尸还万里,虎贲英烈壮千秋”;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分别题写挽词“尽忠报国”、“取义成仁”、“为国捐躯”。1986年,郑作民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
父亲牺牲后,祖母不愿郑作民再当兵,然而作为军人的后代,郑作民依旧选择了从军之路,于1949年9月5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,从军六年后光荣退伍。他做过教员,修过铁路,看守过炸药库,挖过运河,1964年进入潍北农场工作,1990年离休。



【郑作民】

1906年,在昆仑关战役中为国捐躯。九师师长,先后参加淞沪会战、徐州突围战等。1902年生于湖南新田。作为国民党陆军第

抗战时地窖中养伤员 现在孙子也当上军人

本报记者 张永斌

今年89岁的王京理出生于莒县小店镇前山头渊村,至今还生活在这个山村里。8月21日,他在大儿子的陪同下抵达北京,静候9月3日的到来。

到达北京后,老人被授予一枚胸章,上面写着“一一五师二旅六团情报员”的字样。回忆起当年的抗战支前岁月,王京理说,1939年前山头渊村在共产党员王玉璞的带领下,成立了武装常备队,自己家就成为了村党组织的联络点。

1940年9月,王京理成为一一五师二旅六团的情报员,他负责把搜集到的情报,通过专职交通员送到二旅六团团部。有一次王京理传达了日伪军转移的重要情报,部队得到该情报后提前埋伏,未用一枪一弹将敌一个排全部俘获。

王京理还曾承担到敌占区买武器的任

务,他装扮成拾粪的,专选晚上运送买来的枪支、弹药,多次安全将武器送到二旅六团团部。他手上运过的军事物资,有机枪,小枪炮,步枪,子弹、手雷等,为部队作战提供了充足保障。

“我们家在山上,比较隐蔽,家里挖了地窖,长年藏着多名伤员在这里养伤。奶奶和父亲找来小米,熬成粥来喂伤员,父亲有次还专程去胶东,捎信给伤员的家人。”大儿子王建德说。

1944年3月,王京理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后来参加了孟良崮战役,还到莱芜、渤海湾参加支前,这也是他去过的最远的地方。新中国成立后,王京理参加了人民公社,在大队工作。村里开了染布、打油的副业厂后,他又到厂里工作。1980年后厂子倒闭,他回家务农。如今89岁高龄了,他的身体还很硬朗。在爷爷的影响下,王建德的一个儿子也从军人伍,成为一名武警军官,现已转业。



【王京理】

党的情报站,17岁起成为地下情报员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抗战初期,家里是共产党。1926年生于莒县小店镇前山头渊村,1941